



书坊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1-13

齐鲁晚报

2020年8月1日
星期六

好
—
读
—
书

读
—
好
—
书

□ 美编：
编辑：
曲鹏 红

【相关阅读】



《平乐镇伤心故事集》
颜歌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《冬泳》
班宇 著
上海三联书店



《啊,北京》
徐则臣 著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莫言的高密东北乡,贾平凹的商州乡村,阿来的嘉绒藏区,迟子建的冰雪北国,刘震云的延津世界,毕飞宇的苏北水乡……个体是有空间性的,这一点,在作家身上体现尤为明显。继文坛“老炮儿”之后,青年作家的崛起,让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风景变得日益多元丰富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张九龙
实习生 刘知鑫

放不下的小镇

有一句老话:你出生在哪儿,就决定了你的命运。

最近,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纪录片《文学的故乡》,带领观众跟随六位作家重返故乡,走进他们文学梦萌芽的地方,同名图书《文学的故乡访谈录》日前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推出。

片中六位作家是属于一个时代的精神画像,他们有着“50后”和“60后”的时代标签,与新中国同呼吸、共命运,历经过贫困挨饿的落后阶段,也目睹改革开放后的复苏腾飞。他们将家国情怀付诸笔端,从个人视角出发,凝视着社会的发展进程。

对于每个人来说,故乡都是离不开的命题。随着“80后”这批作家日渐摆脱掉反叛情绪、步入而立之年,乡土“80后”的生存体验书写,也已完全褪去青春期的青涩与稚嫩,取而代之的是中年的成熟与老练。他们对故乡的描绘,与文学前辈们截然不同,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别样的中国社会。

“80后”作家颜歌的许多作品,均以平乐镇为发展空间,其原型是其家乡四川郫县。

《关河》是少时写作的古代奇幻故事,《良辰》里开始出现了故乡的痕迹,《异兽志》中故乡的痕迹逐渐加重,到《五月女王》中,故乡这一熟悉的社会空间已经演化成颜歌的取材空间,成为颜歌“第一步彻头彻尾关于平乐镇的长篇”。到《我们家》与《平乐镇伤心故事集》中,平乐镇正式成为显著的空间标志。

平乐镇不仅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,塑造着性格各异的故事人物,更体现着作者的选择与思维方式。颜歌坦言:“我对我们的生活生来悲观。我所看见的世界就像十年前从成都回郫县的那条马路,肮脏,无序,混乱,尘土飞扬而令人窒息……我相信这样的城乡接合部是我的伊甸园,而我充满喜悦地从这里翻找诗篇。”

颜歌在《我们家》《平乐镇伤心故事集》中,运用了大量家乡元素。其中,既有“婆娘”“瓜皮”“龟儿子”“白脸鸡儿”等方言词汇,又有肥肠粉、花椒、海椒、豆瓣酱等地方美味。川味语言、川味人物、川味风情一起,熔铸在颜歌的小说中,成为独特的颜歌风格。

西门成长的豆瓣厂青年薛胜强,南门操扁褂的青年子弟,北门办商的外地人,东门的官家子弟,颜歌将镇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裹挟进她的作品。作为城乡接合部的平乐镇,既有“乡”的特



《文学的故乡访谈录》
张同道 主编
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

家在老工业城

2018年,1986年出生的班宇以“未来文学预言”的形式,宣告了一个作家群体和一座小说城的崛起。几乎同时,1987年出生的郑执,在被称为文学界“蒙面歌王”的“匿名作家计划”中荣膺首奖。在此之前,1983年出生的双雪涛已获得多个文学奖项,成名多年。

三位来自东北的“80后”作家,接连凭借书写东北城市的小说受到瞩目,这种关注,某种程度上与人们对东北的想象紧密关联。传统工业在过去40年间由盛转衰,时代的巨大落差,对应着无数个体的命运跌宕,东北被赋予了某种悲情色彩。

作为沈阳人的双雪涛、班宇和郑执,或多或少都能从父辈中感受到东北工业曾经的荣耀。班宇短篇《盘锦豹子》里在新华印刷厂上班的孙旭庭,大年三十在厂里分到了“两袋冻虾仁、两瓶口子窖、一箱饮料和一袋面粉”。双雪涛短篇《跷跷板》里的李默,向刘一朵表达爱意的方式,是找厂里的工人做了一朵铁玫瑰。

旧有的生活方式被打破,所带来的心理落差是很难面对。当原先的优越感,渐渐坠落成为束缚的“老黄历”,包括“80后”作家在内的东北人,不得不面对着身份认同上的危机。

收录于班宇小说集《冬泳》中的《工人村》,恰如其分地揭露了这种落差。开古董店的老孙、足疗店的吕秀芬、摆烧烤摊的战伟等形形色色的人物,都以各自的方式谋取生活。短篇《梯形夕阳》则叙述了在工厂转型艰难之后,职工不知何去何从,骑着自行车绕着工厂转圈的场景。

面对急速到来的社会变动,新的人际关系、生活方式和环境选择,带给“80后”东北作家翻天覆地的考验。这显然不同于迟子建笔下对东北故乡的深沉眷恋,或是孙惠芬叙写城乡夹缝中的挣扎。他们不自觉地向城市空间靠拢,成为书写城市的年轻一代。

他们在城市书写中用自己的方式,记录了一代人的伤痕与尊严,再次召唤出生而为人的精神力量。他们以严肃的创作姿态,对城市文学做了一次新的拓展,让我们重新关注到这片北方大地上的故事空间。在信息化、经济化、城市化都迅猛发展的今天,这批“80后”东北作家的城市书写,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思考价值。

外乡人在北京

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版图上,北京是少数几个建构起自己文学形象的城市。提及“北京叙事”,老舍、陈建功、刘心武、王朔、邱华栋、铁凝等都在其列。不同的作家,构建了不同的城市空间景观,同时也在不断定义着北京人和北京城的关系。

1978年出生的徐则臣,是“70后”实力派作家。在徐则臣的“京漂”系列小说中,那些都市的“外来者”与“边缘者”,在过去与现在的交错中,试图重构自我的身份认知;在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区隔中,倔强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。

老舍笔下的《四世同堂》,描写的是近代的老北京,那些北京的胡同小巷和市井人情,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。王朔的《看上去很美》等作品,则聚焦北京的大院生活,表现大院文化特有的温暖和优越感。

徐则臣将他的目光,放在了北京四环,甚至四环以外的郊区地带。四环路上聚集的多是知识分子,中国最好的大学都聚集在这里,北大、清华、中关村,这里是知识最密集的地方,而四环以外便逐渐往郊区过渡了。

徐则臣所描绘的北京,不是老舍笔下“地域性”的北京,也不是王朔笔下“开放性”的北京,更不是邱华栋笔下“欲望化”的北京,而是一个更加接地气的“烟火气”的北京。

这里是城市外来者的聚居地。都说北京遍地是黄金,很多外来者来到了北京,成为假证制造者、盗版碟贩卖者、做小生意的人。那些高大气派的写字楼、繁华热闹的商场都与他们无关,与这些城市外来者密切相关的,是低矮破旧的平房、简陋拥挤的地下室、逼仄杂乱的旧单元楼。徐则臣向我们呈现的,是独特却真真切切存在的都市另一面。

《啊,北京》中的“我”和大学同学,租住在北大承泽园的一栋破楼里,后来因为“我”与边红旗的偶然交集,成了合租的室友。孟一明要上课教书,“我”要写小说和到处乱逛,边红旗写诗的同时还是一名伪证制造者。

平时各忙各的,彼此只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。唯一的交集,就是晚上偶尔串门聊天或聚会。但他们在聚会时,却可以敞开心扉边说边聊,没有丝毫算计和陌生。他们善良、仁义,可以不计报酬地帮助对方。

就像徐则臣在《跑多远才能回到家》中所说:“在北京,宾馆、酒吧、夜总会和高尚社区是一个人间,很多人围着麻辣烫的摊子也是一个人间,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。”他向我们呈现的,是一个有烟火气的北京。他能够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,来挖掘出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,展示现代城市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困境。

徐则臣的北京书写,并不是所谓的“底层文学”。虽然他笔下写的是底层人物,写的是底层的生存状态,但是在这些人身上,没有底层人的自我怜悯与愤懑,也没有因为生活窘迫而对整个社会心怀怨恨。“他们不是想当然的‘底层’——除了从事职业的不同,他们和我们没有任何区别。他们和我们一起站在天桥上看人来人往。”

在徐则臣的小说中,故乡和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充斥其中,笔下的人物在“弃乡”和“逃城”之间不断思考。他们都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心,不满足于故乡现有的生活,充满了对大都市的向往。

然而现实中,他们在北京却饱受生存的压力,陷入精神的困境。他们向往的资源和机会都没能获得和实现,面临的是没有固定的住所、没有合理的身份,甚至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。他们既不愿回到家乡继续过平淡的日子,又无法融入北京,“弃乡”和“逃城”的主题,构成了徐则臣小说的叙事张力。

人与城的矛盾,不仅属于北京,而是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。徐则臣的书写,向我们展示了华丽外表包装下的北京,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城与人的关系。如果从这个角度去阅读其作品,那么不仅能理解徐则臣身为作家的人文关怀,而且也能引发社会对城市外来者更多的关注,其意义已超出了文学本身。

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乡。曾经认为回不去的乡土,并没有阻碍文学“后浪”的灵魂思索。他们只是用另一种角度,去书写故乡、记录时代,丰富着属于“后浪”的精神地理。